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3.006

# 勇于自我革命：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

金文斌，王善武

(安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红军长征艰苦卓绝、苦难辉煌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刀刃向内，在前进方向上，果断放弃原定行军路线，选择了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转移方向；在中央领导层面上，及时撤换“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作战方针上，果断摒弃教条主义呆板战法，实行灵活机动多变战术；在战略选择上，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错误主张，毅然扛起北上抗日旗帜；在政治生活上，坚决反对分裂活动，运用统一战线原则解决当前紧要迫切问题；在精神状态上，坚决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树立革命乐观主义信心。可以说，勇于自我革命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红军长征；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前进方向；中央领导；作战方针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9)03-0033-06

**引用格式：**金文斌，王善武. 勇于自我革命：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4(3)：33-38.

## Brave Self-Revolution: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Victory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JIN Wenbin, WANG Shanwu

(College of Marxism,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133,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with hardship and suffering is a history of self-r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long Marc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dared to turn blades inward. In terms of the direction of advance, we resolutely abandoned the original marching line and chose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enemy's strength was relatively weak; in terms of central leadership, we promptly replaced the "left" adventurist leaders and established the central leading collective represented by Comrade Mao Zedong; in terms of operational policy, we decisively abandoned the dogmatic and rigid tactics and implemented flexible and flexible tactics; in terms of strategic choices, we resolutely opposed Zhang Guotao's erroneous proposition of going south

**收稿日期：**2019-03-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整体性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研究”(14BKS109)；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中国革命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全过程的路径研究”(18JDSZK044)；安徽省振兴计划项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名师工作室”(Szzgjh1-1-2016-16)；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红色文化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全过程研究”(19JDSZK053)

**作者简介：**金文斌(1971—)，男，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大学教授，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王善武(1992—)，男，安徽枞阳人，安庆师范大学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and carried the banner of going north to resist Japan; in terms of political life, we resolutely opposed separatist activities, and applied the principle of unity to solve the present urgent problems; in terms of the mental state, we resolutely overcame pessimism and disappointment and built up revolutionary optimism. It can be said that self-revolu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victory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Keywords:**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lf-revolution; direction of advance; central leadership; operational policy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sup>[1]</sup>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思想新内容新要求。当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历史进程的宏观层面，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历史必然、党的建设等方面，微观层面的研究尚未深入。

回顾二万五千里艰苦卓绝、灿烂辉煌的红军长征，笔者拟从前进方向、领导指挥、作战方针、战略选择、政治生活和精神状态等六个维度，论证红军长征时期党的勇于自我革命。为什么红军将士能在那样艰难险阻情况下，克服一个又一个似乎不可能克服的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貌似不可能战胜的敌人，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呢？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红军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学习和研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自我革命思想，有助于积极传承党的红色基因和深刻把握党的优良传统，加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自信，其对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 一 前进方向：果断放弃原定行军路线，选择了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转移方向

红军长征是一次战略大转移，转移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前进方向的选择。红军长征初期，红军向哪里去的行军方向问题一直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湘江一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蒋介石已

觉察到中央红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可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按事先地图上画好的路线，不顾敌情的变化，坚持按原定行军计划，准备直接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危急关头，处于被孤立境况的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建议，要充分考虑到敌情的变化，避开敌人的封锁线，放弃原来制定的计划。他力主部队“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sup>[2]</sup>。经过认真考虑，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在湖南省通道县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向大家分析了红军周围敌人围堵的严重情况。他认为敌情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坚决不同意李德、博古仍坚持去湘西“与二军团建立联系”<sup>[3]</sup>的意见，再一次强调如果红军去湘西，后果将不堪设想，再一次建议红军的行动方向是“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sup>[4][38]</sup>。经过激烈讨论，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红军主力行走在西进的道路上，但争论还在继续。在黎平会议上，博古又提出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毛泽东仍然坚持向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进军。又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与会多数人支持毛泽东。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sup>[4][39]</sup>，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避免了红军一场危机。在猴场会议上，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错误主张。

红军到达黔北后，发现此处江宽水急，敌军已在长江沿线布置重兵，敌机也经常低空袭扰，渡江极其危险。如果红军不改变以前的行军路线，后果也将不堪设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考虑敌情和地形的变化，指挥红军及时掉转方向，迂回前进，从云南皎平渡口，利用7只渡船，9天9夜巧渡金沙江，彻底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的计划。另外，红二十五军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成功西进，被毛泽东称赞“为革命立了大功”<sup>[5]</sup>。正是由于选择了正确的行军路线，红军才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胜利突围，最终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

## 二 中央领导层：撤换“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常常讨论党和红军大事，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sup>[4]437</sup>，张闻天也“很快地接受了他（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sup>[6]</sup>。经过湘江战役后，红军由出发前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广大红军将士开始思考，失利的原因到底在哪？希望又在哪？“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sup>[7]</sup>毛泽东适时“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sup>[4]437</sup>。周恩来1972年6月在一次会议上说，从黎平到遵义行军途中，“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sup>[8]</sup>

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举行的，没有像以往那样，会议的组织、纲领的提出、决定的起草等都按共产国际指令进行<sup>[9]</sup>，这次会议是中央领导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变化的情况召开的。会上，同为“左倾”中央领导集团的张闻天，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中分裂出来，针对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的“主报告”，作了一个“反报告”，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投了毛泽东“关键性的一票”。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会议上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撤消了博古负总责的权力，撤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独立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层，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用党内民主的办法，平稳地解决了党中央的领导权问题。周恩来后来说：“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消灭，而能渡过长征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以及一、三军团骨干的努力。”<sup>[10]64-65</sup>张闻天也曾在笔记中写道，如果没有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李德、博古的领导还会持续，红军还会遭受严重的损失，甚至会被打散，“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sup>[10]79</sup>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攻打鼓新场。虽经毛泽东多方做工作，红军避免了重大损失，但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sup>[4]450</sup>他认为作战还是要成立几个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那么多人来指挥，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那么多人通过会议表决来指挥作战。红军在三个人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三人团”。“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实际上毛泽东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sup>[11]</sup>，指挥红军作战。

## 三 作战方针：果断摒弃教条主义呆板战法，实行灵活机动多变战术

为什么遵义会议前后红军会有两种不同的命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会议前，也就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一系列危局中，尤其是在湘江战役的惨重失利中，“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sup>[9]338</sup>博古、李德等人战术呆板，他们习惯于在地图上用铅笔画线式的方式领导红军作战，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不了解实情的遥控指挥，就像毛泽东所说，“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吃了先生（注：共产国际）的亏。”<sup>[9]338</sup>红军要想取得胜利，必须由熟悉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领导来指挥，必须采取高度机动的方式来作战，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这样才能“走到再光辉的未来”<sup>[12]</sup>。

长征初期，蒋介石察觉了中央红军北上要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意图，在沿途设下重兵，可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偏偏“通道转兵”，向西进攻敌人薄弱的贵州地区，将敌部署置于无用之地。在蒋介石看来，红军不敢穿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不敢爬上“连鸟都飞不过的”皑皑雪山，可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克服饥饿、疾病、冰雹、泥坑等重重困难，出其不意，偏偏走通了这条路。在长征途中，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王震曾回忆红

二、六军团转战湘黔边时“打得机动灵活，有声有色，运用自如，所向披靡，是红二方面军战史上的光辉范例”<sup>[13]</sup><sup>495</sup>。红四方面军也同样采取了这种战术，“经过一周艰苦鏖战，重创了敌军”<sup>[14]</sup>，最终夺取了岷洮西战役的胜利。长征途中，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sup>[15]</sup>，充分运用“走”和“打”的办法，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直接指挥的运动战。他创造性地把历代兵家的谋略如出其不意、声东击西、避实击虚、诱而取之等运用得淋漓尽致，让3万红军巧妙地穿插迂回于几十万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在机动中创造新的战机。当发现敌军弱点时，立即集中兵力，歼敌一部，然后迅速摆脱强敌跟追，使敌人措手不及，摸不清红军的虚实动向。这样，敌军不但没有能够围歼红军，反而被神出鬼没的红军吃掉一大块。红军通过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破了敌军的围追堵截，牢牢地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毛泽东后来说，他一生最满意的战役是红军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之战。

#### 四 战略选择：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错误主张，毅然扛起北上抗日旗帜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逐渐升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虽然自身生死难料、前途未卜，但始终没有放弃“北上抗日打东洋”的宣传，始终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针对1935年日本对华北侵略的扩大，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地把河北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致使中华民族又一次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当中，还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奔赴抗日前线联系在一起，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响亮地提出“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的首要任务。这样，红军的长征，就有了“北上抗日”新的动力。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这样说过：“共产党人认为，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sup>[16]</sup>他认为红军的“北上抗日”，在一定程度上，是长征得以胜利的重要原因。

连一个外国记者都明白的道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似乎不清楚。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是“北上”，走向抗日前线，还是“南下”，深入不毛之地，这又是一道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战略方向如何选择的难题。张国焘坚持南下，党中央则坚决主张北上。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千方百计地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影响，毅然决然地率领一部分中央红军单独北上，突破了腊子口天险，到达吴起镇，与刘志丹、徐向东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以后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奠定了基础。而张国焘此时还在“南下”的泥潭中徘徊彷徨、失落失利、犹豫不决。经历“南下”整个过程的徐向前回忆道：“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sup>[17]</sup>许许多多红四方面军将士也是经过“南下”的曲曲折折，才真正理解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

1935年11月，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国民党面对日本侵略采取的不抵抗主义比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高举抗日大旗、积极抗日的，共产党人已经站到了民族道义的制高点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红军长征中“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是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战略主动”<sup>[18]</sup>。

#### 五 政治生活：坚决反对分裂活动，运用统一团结原则解决当前紧要迫切问题

当时，张国焘拥兵自重，执迷不悟，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妄图以枪指挥党，阻止红军北上，继续坚持南下。一方面，“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的命题”<sup>[19]</sup>，坚持做说服张国焘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求他放弃南下的错误做法，对张国焘分裂行径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坚定不移地督促其贯彻执行中央既定的战略方针；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红军分裂，加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中央在人事安排上适当考虑，先后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

张闻天曾主动提出让出他中共中央总负责的位置给张国焘，但毛泽东坚持原则，坚决不同意，毛泽东说：“他（注：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sup>[20]</sup>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原则性斗争是非常有预见性的。

张国焘准备“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时，毛泽东等人被迫率领一部分中央红军单独北上。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的会议上，有人建议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为了教育和争取张国焘，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一级，并未向全党公布。当张国焘在卓木碉公然成立“中央”等非法组织时，又有人提出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还是不同意。彭德怀后来回忆道：“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彭德怀由衷地赞叹毛泽东的这种处理方式，“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典范”<sup>[21]</sup>。可以这么说，开除张国焘一个人的党籍容易，但要清醒地看到他还统率着红四方面军8万多的军队。如果一时兴起，开除了他的党籍，就有可能造成红军的分裂。如果没有全党全军的这种团结一致，就没有红军长征最后的胜利。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开得成功，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迫切要求，在大敌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抓住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周恩来曾回忆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周恩来感叹道：“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sup>[22]</sup>

张闻天在延安时也谈道：“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这在毛泽东

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sup>[23]</sup>毛泽东这种处理方式适合当时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既保证了最主要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解决，又维护了党内的团结一致。反之，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 六 精神状态：坚决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树立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4年10月中旬，红军转移临行前，毛泽东在瑞金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领导人会议上指出：“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sup>[4]433</sup>并对将要留在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sup>[4]435</sup>

在行军途中，林彪一直埋怨走的尽是“弓背路”，认为这样会把部队拖跨。他还给中央军委写信，提出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意见。<sup>[13]126</sup>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sup>[4]454</sup>他认为，在当时危急的情况下，只有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才能摆脱敌人的重兵包围。他要求大家树立信心，坚持战斗，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960年10月22日，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问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是什么时候，毛泽东说，1935年长征时“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sup>[9]213</sup>。当时，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的主张，毛泽东在1935年8月20日召开的毛儿盖会议上，起草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补充决定认为，张国焘的主张“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sup>[24]</sup>。对于张国焘当时的心态，朱德的分析入木三分：“到了毛儿盖后，他（注：张国焘）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了，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sup>[25]</sup>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指出：“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sup>[4]472</sup>他还自信

百倍地认为,在陕、甘首先取得胜利是不能否认的。历史恰恰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央红军主力翻越岷山,“更喜岷山千里雪”,红军马上要到达陕北,革命前途露出胜利的曙光。在这个时候,有人说红军人数少,流露出悲观的情绪。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及时在1935年9月20日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说,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呢”<sup>[26]</sup>。1935年10月,8万多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多人,个个破衣烂衫的,成了“皮包骨”,看似羸弱不堪,当时“有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sup>[27]</sup>。确实如此,虽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人数不到出发前的十分之一,但这些经过生死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是中国革命的精华,可以以一当十。正是以这些中国革命的精华为骨干,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一路凯歌猛进,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总而言之,漫漫红军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一系列自我革命中,选择了正确前进方向,建立了正确中央领导,实行了正确作战方针,进行了正确党内斗争,扛起了正确抗日大旗,保持了正确精神状态,才一次次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绝地重生,带领红军将士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非常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敢于与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坚决的斗争,坚持不懈地勇于自我革命,我们才能战胜困难,取得新长征路上新的胜利。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589.
- [2]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M]//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3.
- [3]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124.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5] 程子华.记吴焕先同志[M]//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9.
- [6]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M]//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8.
- [7] 刘伯承.刘伯承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4.
- [8]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M]//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6.
- [9]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38.
- [10]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4-65.
- [11] 石仲泉.我观红军长征的若干重大事件[J].中共党史研究,2016(10):32.
- [12]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02).
- [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495.
- [14] 杜义德.回顾岷山战役[M]//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272.
- [1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91.
- [16]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160.
- [17]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476.
- [18]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0-22(02).
- [19] 陈长里,陈莉好.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创新[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3(2):81.
- [20]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79.
- [21]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05.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62.
- [23]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3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221.
- [2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48.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53.
- [26]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282.
- [2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39.

责任编辑:黄声波